

位与安置的空间隐喻”。^① 从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开始，在中亚述的年代记中出现了对外族所生活地区的“不易抵达”特性的描述，学界将其称之为“艰难之路”(difficult path)的文学传统，显然，“敌人所居住的世界的不可接近性和陌生感，被用作对文化差异或对非亚述国家和人民的‘他者性’的隐喻”。^② 在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对哈尼加尔巴特王国的战争中，亚述人“开辟了最艰难的道路和山口”才得以进入该王国的领土，图库提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的年代记把库提人生活的地方描述为“遥远的库提之地，道路极其艰难”，把亚美尼亚高原的奈里国(Nairi-land)描述为一个异常偏远的地方，“我凭借超乎寻常的强大力量，经常穿越难以逾越的石山，而这些山路是其他国王所不知道的”。亚述人“用铜镐凿开他们的山，并拓宽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道路”，这可能就是对亚述人与野蛮的异族世界取得联系的某种隐喻。在中亚述年代记中，就把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卑劣的异域族群的主题结合起来，把生活在这些困苦地区的族群描述为缺乏勇气的懦弱人群，库提人因为亚述人发动的战争而“惊恐万分”，最终只好跪倒投降，“阿尔祖国的国王埃赫利特舒布”因为恐惧而“带着他的侍臣和儿子，抛弃了他的整个国土，秘密地逃到了奈里这个未知之国的边界”，中亚述铭文也把这些地区的族群描述为采取阴谋手段的不光彩者，哈尼加尔巴特王国的人为了阻止亚述人，截断了亚述军队“前进道路上的山口和水源”。^③

在中亚述时期，亚述确立了君主制，并对外推行扩张政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亚述开始与西亚北非地区的其他大国开展外交往来，成为古代西亚北非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巩固统治和树立大国形象，亚述需要重新塑造其独特的国家和集体身份。因此，为了调和城邦传统与王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在西亚北非世界树立悠久王统的大国形象，中亚述在历史叙事中积极地重塑了亚述的形象与观念。总体来看，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上，突出亚述悠久的王政传统，并推崇征服者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小国寡民的城邦属性，强调亚述的地域王国特性；在族群维度上，一方面强调其他族群的异己性，另一方面发明了“亚述人”这个词，以取代城邦时代的“亚述之子”。中亚述时期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为新亚述时期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亚述从城邦走向帝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及其帝国隐喻与影响*

李大伟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7)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作为一部典型的启示录作品，其关于帝国的隐喻

① [美]卡洛琳·加拉尔·卡尔·T. 达尔曼、[美]艾莉森·芒茨等著，王爱松译：《政治地理学核心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② Megan Cifarelli, *Enmity, Alienation and Assyrianization: The Rol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Visual and Verbal Expression of Assyrian Ideology in the Reign of Ashurnasirpal II (883-859 B. C.)*, p. 74.

③ A. Kir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I,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 BC)*, pp. 183-184, 235-236, 244, 272.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与叙事备受古今学者关注。受圣经解释传统的影响,关于《但以理书》帝国隐喻的解释甚多,当前学界关于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帝国解释与末日叙事等主题。^① 本文拟在前人关于《但以理书》帝国隐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但以理书》成书过程及其整体文本叙述架构,对其帝国隐喻与叙事进行新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析《但以理书》的编修思路及其启示,揭示《但以理书》成书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即犹太人在反抗希腊化塞琉古帝国时的集体心态和对未来的设想,同时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窥探《但以理书》所蕴含的帝国叙事及其神权历史学观念对东西方诸地历史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成书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主要记载了一位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但以理在宫廷解梦并解释异象的活动,探讨了生活在异族国王统治下的犹太人所面临的挑战与期许。在死海古卷及古代希腊文文献中曾提到但以理的故事,^② 古代迦南一些地区将其视为先知。^③ 但是,拉比传统否认但以理所叙述与解释的异象及其预言,拒绝赋予其先知身份。^④ 因此,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Tanach)中,《但以理书》被列为圣录(Kethuvim)中的一卷,通常被视为经典的启示录作品。^⑤

《但以理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1~6章用第三人称书写,主要由六个宫廷故事构成,发生在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和米底王大流士统治时期,主要叙述了先知但以理在宫廷为国王解梦及其遭遇;第7~12章用第一人称书写,内容包括四个启示录异象,发生在伯沙撒、大流士与波斯国王居鲁士时期,主要叙述了但以理解释异象及启示等。

在书写语言方面,《但以理书》第1:1-2:4a节、第8~12章以希伯来语书写,第2:4b-7:28节以亚拉姆语书写,这与《但以理书》内容结构的分类并不一致。关于此种差异,学界围绕《但以理书》成书过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诸多解释。早期学者大多主张《但以理书》的原作最初为一个整体,以一种语言写作,后被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亚拉姆语为当时古代近东地区的国际通用语言),或认为《但以理书》原作便同时使用了两种语言进行写作。^⑥ 但是,这两种认识被认为忽视了《但以理书》在“故事”与“异象”等内容结构方面的差异性,同时也并不能解释缘何只有部分章节被翻译的现象。因此,以霍尔舍尔(Hölscher)、约翰·柯林斯(John J. Collins)和劳伦斯·威尔斯(Lawrence M. Wills)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并非一次性写就,其中第2~7章用亚拉姆语写成,第8~12章用希伯来语写成。关于第1章,有学者指出其可能用希伯来语写成,或者由亚拉姆语翻译为希伯来语,因为希伯来语更适合作为引言。^⑦ 如约翰·柯林斯认为《但以理书》第1:1-2:4a节可能用亚拉姆语写就,但是后来被翻译为希伯来语。^⑧ 《但以理书》很容易被认为是由但以理在公元前6世纪所作。但是,此说很早已经受到质疑,公元3世纪的希腊学者波菲利(Porphyr)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反映了塞琉古王国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时期犹太人与希腊人冲突的历史。^⑨

① 参见 John J. Collins, *Daniel: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Andrew B. Perrin, et al., eds., *Four Kingdom Motifs before and beyond the Book of Daniel*,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王婷:《〈但以理书〉第7章中异象及其对异邦统治的回应》,《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1期;刘林海:《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Michael E. Stone, *Ancient Judaism: New Visions and View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1, pp. 67-68.

③ [古罗马]约瑟夫著,冯万以文等译:《犹太古史》上册,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534-536页。

④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43.

⑤ 希伯来圣经由三部分构成,分别为《托拉》(Torah)、先知书(Nevi'im)与圣录(Kethuvim,又译为“作品集”或“圣卷”),通常分为24卷。基督教《旧约》则将《但以理书》作为大先知书,将但以理视为先知。

⑥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 1641.

⑦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 1641.

⑧ John J. Collins, *Daniel: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pp. 28, 30.

⑨ 参见刘林海:《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但以理书》第一部分先于第二部分写成，如约翰·柯林斯指出第2~6章呈现出一种人为的文学写作手法，旨在将该书的两部分结合在一起。^①《但以理书》第二部分“异象”中的内容指向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的迫害，应在马加比时期被书写。^②《但以理书》第1~6章被认为写于公元前3世纪。^③因此，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但以理书》出自不同作者，是在最初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扩大到第二部分，最终在马加比时期统一编修成书。

二、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帝国隐喻与叙事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第2章与第7章分别以故事和异象的叙述形式，用人像与海兽隐喻“四大帝国”的形象，并借助但以理解梦的方式加以呈现。其中第2章记载了关于尼布甲尼撒之梦的故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座巨大的人像，头为精金，胸膛和膀臂为银，肚腹和腰为铜，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脚砸碎，变成一座大山。对此但以理解释道：“王啊，你就是那金头。之后必另兴一国，又有第三国是铜的；第四国坚壮如铁……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存到永远。”第二部分第7章记载但以理梦见了“四个海兽与人子，前三兽分别如狮、如熊、如豹，第四兽头有十角，后又长起一个小角……还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得了权柄……告诉但以理：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其中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他的权柄必被夺去”。^④

但以理在第2章的叙述中称尼布甲尼撒即为金头，明确提示新巴比伦王国为第一帝国，这对应于第7章中的狮被解释为巴比伦帝国。^⑤《但以理书》第8章(8:15-24)记载“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米底和波斯王”，^⑥因此米底与波斯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与第三帝国，即第2章人像的银胸与第7章中的熊被认为是米底；第2章人像的腹部与大腿及第7章中的豹子代表波斯。^⑦在但以理的叙述中，第四帝国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即第2章人像的腿与第7章十一只角的野兽代表希腊，这是因为《但以理书》第8章(8:21)明确提到了“那(带角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其他的角都从中衍生出来，预示着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希腊化王国，第7章记载第四帝国对圣民的迫害则与安条克四世迫害犹太人高度相关。^⑧希腊帝国分裂为诸多小王国，被表述为诸多形态，如铁与泥混合的人像的脚及野兽的十个角等。这十个角应代表自塞琉古一世以来的国王，^⑨第十一个小角指安条克四世，其与圣徒为敌，最终被推翻，迎来上帝永恒之国。^⑩

因此，在《但以理书》第2章与第7章中分别以人像与海兽的方式所隐喻的“四大帝国”，通常被认为是新巴比伦、米底、波斯与希腊。在古代帝国叙事中，通常将亚述作为第一帝国，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在帝国叙事中亦先提到亚述帝国，随后为米底和波斯。^⑪

① John J. Collins, *Daniel: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pp. 30-31.

② 参见王婷：《〈但以理书〉第7章中异象及其对异邦统治的回应》，《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John J. Collins, *Daniel: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p. 28.

④ 参见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p. 1645-1646, 1655-1656, 1656-1657.

⑤ Katharina Bracht, "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in Hippolytus's Commentary on Daniel," in Andrew B. Perrin, et al., eds., *Four Kingdom Motifs before and beyond the Book of Daniel*, p. 173.

⑥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 1658.

⑦ Katharina Bracht, "The Four Kingdoms of Daniel in Hippolytus's Commentary on Daniel," in Andrew B. Perrin, et al., eds., *Four Kingdom Motifs before and beyond the Book of Daniel*, p. 173.

⑧ Michael J. Gruenthaner, "The Four Empires of Daniel,"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Vol. 8, No. 2(1946), pp. 202-205.

⑨ Michael J. Gruenthaner, "The Four Empires of Daniel," pp. 201-206.

⑩ G. R. Beasley-Murray,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niel 7,"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1983), p. 45.

⑪ 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5-95页。

《但以理书》的书写显然改变了帝国叙事的序列，选择将新巴比伦视为第一帝国，被认为是将帝国历史叙事与巴比伦的但以理传说及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磨难联系起来，以契合犹太人的历史。《但以理书》的叙述者将犹太人的历史置于当前救赎的关键节点，展现了犹太人对塞琉古统治的反抗，并预言神圣之国最终到来，构成了但以理预言与启示的核心观点。^①

前述《但以理书》第一部分“故事”与第二部分“异象”在不同时期写就，为两个独立的篇章内容，在马加比时期被统一编修成文。但是，从帝国叙事的角度而言，可以看到《但以理书》中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篇章暗含一个整体框架。在《但以理书》第一部分“故事”中，第1章交代了但以理及其三位犹太友人被俘至巴比伦，以及但以理精通异象与梦兆等情况，并提及但以理一直活到波斯居鲁士王元年，为整个叙述交代了背景情况。第2章则以“尼布甲尼撒之梦”为主题，但以理为之解梦，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新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的帝国序列，并预言“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2：44-45）。同时，但以理得到赏赐，尼布甲尼撒王亦认可“你们（犹太人）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2：47-48）。^② 第3章主要叙述了但以理三位友人被投入火窑之事，第4章接续尼布甲尼撒解梦的主题，但以理为其解第二个梦，言及：“你（尼布甲尼撒）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4：25）。尼布甲尼撒对此感到惊恐，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久的，他的国存到万代”（4：34）。第5章则主要叙述尼布甲尼撒之子伯沙撒盛宴的故事，仍以巴比伦王国为主题，但是在末尾提到“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米底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取了迦勒底国”（5：30-31）。第6章的叙述转入米底王国，主要讲述了米底王大流士时期但以理落入狮坑后获救，言及“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6：28）。^③

在《但以理书》第2部分“异象”中，第7章与第8章的叙述仍设定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即但以理讲述的“海兽与人子”异象及“公绵羊和公山羊”异象，天使加百列对此解释道：“其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米底亚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8：20-21）。第9章的叙述设定在米底时期即米底王大流士元年，借用耶利米的预言讲述但以理为同胞的祷告。第10~11章讲述但以理在底格里斯河畔所看到的异象及天使的启示，并言及“现在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争战……希腊的魔君必来”（10：20）。^④

因此，可以看出《但以理书》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叙述皆遵从新巴比伦—巴比伦—米底—波斯的帝国序列，并提及了希腊（《但以理书》第二部分第8章与第10章）。最后，《但以理书》在第12章达到了启示的高潮，预言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12：1-2），预示着末日神圣天国的到来与最终胜利，并称“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12：9）。^⑤ 这一陈述不仅标志着该单元（第二部分）的结束，也标志着整本书的结束。^⑥ 由此可以看出，与《但以理书》第2章和第7章所隐喻的帝国类似，《但以理书》的整体内容亦呈现了帝国叙事的基本框架，即以新巴比伦、米底、波斯到希腊的“四大帝国”为但以理预言与启示的核心框架，显示随着“四大帝国”的灭亡，上帝神圣之国终将胜利，为当下反对塞琉古的统治及马加比起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马加比时期《但以理书》的编修者应是以这样的

① Joseph Ward Swain,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narchies Opposition History Under the Roman Empir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XXXV, No. 1 (1940), p. 10.

②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 1646.

③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p. 1651, 1653, 1655.

④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p. 1658, 1662.

⑤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 1665.

⑥ John J. Collins, *Daniel: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p. 32.

思路与预设,将第一部分的“故事”与第二部分的“异象”两个不同时期的文本组合起来,形成了最终的《但以理书》文本。

余 论

作为一部典型的古代启示录作品,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以古代世界流传的帝国叙事,对应自巴比伦之囚到希腊塞琉古时期犹太人被异族王国统治的历史,讲述了犹太人抵抗迫害者的过去与现状,预言上帝永恒之国的最终胜利,形成了但以理传统的“四大帝国”历史叙事及犹太教末世审判观念。《但以理书》的编修者将自己置于反抗塞琉古王朝的历史背景与救赎节点中,通过犹太人对迫害者的抵抗来解释过去、现状与未来,以论证上帝对历史的主导及上帝神圣王国的最终到来,这一主题与启示贯穿《但以理书》全书,并成为《但以理书》的核心要义与编修思路。

《但以理书》关于帝国隐喻的神学表达被后世犹太作者承袭,出现与之类似的表述,并在关于希伯来圣经的解释中不断流行,鲜明地反映了此时犹太人在反抗希腊化塞琉古帝国时的集体心态及对未来的设想。如被认为写作于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前160年间马加比起义末期的犹太文献《以诺书》(*1 Enoch*, 1:89-90)亦记:“狮子和豹子吞食了大多数羊,烧毁了房屋(意指巴比伦人与圣殿被毁);从波斯返回后,鹰开始吞食羊(意指希腊人,之后分为托勒密与塞琉古),啄它们的眼睛。”^①公元1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37—100年)在《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中亦承袭了《但以理书》的记载:“这是你所见的梦……金头代表你及在你之前的巴比伦国王;两只手和两只胳膊象征着你的政府将被两个国王解散。但是另一个国王应来自西方……尼布甲尼撒国王统治43年后……上帝将把你的王国撕碎分给米底人与波斯人……但以理看到一个大角从公山羊头上长出,当这个角破裂时分出四个角……一位来自希腊的人将会得到波斯人整个领地……从他们中将会出现一位国王战胜我们的国家,事实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②

同时,《但以理书》以人像与野兽形象等象征方式隐喻新巴比伦、米底、波斯与希腊“四大帝国”,这种模糊的表达为后世作者根据新的形势与帝国形态进行解释提供了空间。受圣经解释传统影响,《但以理书》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解释。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由于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基督教作家对《但以理书》的帝国隐喻不断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基督教历史发展轨迹。以哲罗姆(Jerome)、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和奥托(Otto of Freising)等为代表的基督教作家以《但以理书》“四大帝国”历史叙事进行世界历史书写,通过帝国更替的历史叙述实现东西方历史的勾连,古代中世纪时期西方与近东地区的历史得以接续。^③因此,这一源自古代近东地区希伯来圣经传统的神权历史学观念,发展成为古代中世纪时期西方主要的历史观念与书写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认知,推动并揭示了文明交往中共同的历史意识与观念,对东西方文明共同文化认同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Patrick A. Tiller, *A Commentary on the Animal Apocalypse of 1 Enoch*, EJL 4,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pp. 320-360.

② [古罗马]约瑟夫著,冯万以文等译:《犹太古史》上册,第524-528页。

③ 参见 St. Jerome, *The Chronicle of St. Jerome*, Oxford: The Warden and Fellows of Merton College, 2005;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Roy J. Deferrari, trans.,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Otto Frisingensis,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 D.*, C. Mierow, trans., A. Evans and C. Knapp,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5.0002

主持人语(吕厚量):上古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然而,在传统的史学史叙述语境下,上古两河流域往往被视为一个“有史料而无史学”的世界而受到忽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虽然我们仍无明确证据断定,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前的两河流域曾孕育过成熟的史学作品,但是犹太和波斯等后期两河流域文明已经形成了具备朴素求真意识与反思特征的史学萌芽,并对希腊罗马史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直接影响。亚述和赫梯等文明的历史书写传统,同样对两河流域地区的政治传统与族群观念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笔谈的四篇文章分别围绕古波斯《贝希斯敦铭文》与史学作品的异同、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中的帝国隐喻、中亚述时代历史叙事对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和赫梯节日文献的历史书写对王室家族身份的塑造等主题展开论述,并着重指出相关文献对后世史学与政治传统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便说明上古两河流域历史书写传统在中东乃至世界史学史上的意义与特色。

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 史学萌芽及其潜在局限性

——以《贝希斯敦铭文》为例^{*}

吕厚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史学史与历史哲学研究在此大背景下兴起,多数有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将古希腊史学视为近现代史学的唯一重要源头,同时有保留地承认,中国古代史学与《旧约圣经》等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历史书写也在世界古代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①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研究和“晚期古典”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对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史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古代犹太历史思维对西欧和拜占

收稿日期:2024-09-01

作者简介: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学;袁指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古代近东史与古代近东外交史;李大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犹太史;蒋家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史(赫梯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亚述学)与古代近东文明史。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221页;[美]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6页。